

中國史學家評傳

陳清泉 蘇双碧 李桂海 蕭 黎 葛增福 編

下

陈清泉 苏双碧 李桂海 萧 黎 葛增福 编

中國史學家評傳

周谷城題

下

内 容 提 要

《中国史学家评传》分上、中、下三册，分别评介从春秋到五代，从宋代到清中叶（鸦片战争前）和近现代已故著名史学家八十多人的生平事迹、史学论著。全书约一百二十万字。

本书在评介各史学家的生平事迹时，实事求是，简明中肯。其重点在于从史学思想、治史态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对各史学家的史学、史才、史识、史德进行全面的评述，以阐明各史学家及其论著在我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地位和影响。全书资料翔实，理论性强，观点鲜明正确。适合于高等院校文科师生，以及其他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爱好者研究、阅读。

下册评述近现代已故著名史学家二十七人。

中国史学家评传

（下册）

陈清泉 苏双碧 李桂海 萧黎 葛增福编

责任编辑 后 录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5印张 453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830册

统一书号11219·34 定价 $\begin{matrix} 3.50 \text{元} & (\text{平}) \\ 4.60 \text{元} & (\text{精}) \end{matrix}$

目 录

- 魏 源·····陈清泉 (1105)
- 赵尔巽·····王思治 秦宝琦 (1123)
- 章太炎·····汤志钧 (1151)
- 孟 森·····商鸿逵 (1166)
- 梁启超·····孟祥才 (1190)
- 王国维·····袁英光 (1217)
- 陈 垣·····陈乐素 (1244)
- 吕思勉·····杨 宽 (1270)
- 岑仲勉·····姜伯勤 (1299)
- 邓之诚·····邓嗣禹 周一良 王钟翰 (1326)
- 陈寅恪·····金应熙 (1343)
- 胡 适·····耿云志 (1380)
- 郭沫若·····尹 达 (1408)
- 顾颉刚·····刘起钎 (1438)
- 洪煊莲·····翁独健 刘子健 王钟翰 (1464)
- 范文澜·····朱瑞熙 刘仁达 徐曰彪 (1473)
- 稽文甫·····稽道之 (1503)
- 李 济·····胡厚宣 (1519)

葛伯赞	张传玺	(1528)
郑天挺	冯尔康	(1562)
吕振羽	叶桂生 刘茂林	(1581)
萧一山	萧立岩	(1604)
何干之	胡 华 刘 炼	(1622)
尹 达	林甘泉 叶桂生	(1645)
吴 晗	苏双碧	(1664)
陈梦家	王世民	(1690)
邓 拓	刘永成	(1714)
编辑后记		(1725)

魏 源

陈 清 泉

(一)

鸦片战争前后，我国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思想家，一个是龚自珍，一个是魏源，世以龚、魏并称。魏源“喜经世之略，其为学淹博贯通，无所不窥。”^①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很大，《默觚》、《圣武纪》、《海国图志》，论古证今，兼及中外，在近代史上颇有影响。

魏源的祖先是江西太和县人，明朝初年迁居于湖南邵阳的金潭。祖父以前是颇为殷实的地主。有一年，湖南遇到大荒年，老百姓无衣无食，官府催征田赋急如星火，几乎酿成民变。魏源的祖父魏志顺为了维护地方封建秩序，卖田出谷代为交租，避免了一场变乱，由是“家亦中落”。^②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在江苏做过小官，对家庭照顾不上，因此家道“益窘”。^③

魏源字默深，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七八岁时，入家塾，即日夜苦读，母亲常常劝告他灭灯就寝，他则篝灯被底，继续读书。九岁应童子试，县令在唱名时指茶瓯中的《太极图》说：“杯中含太极”，要魏源作对。魏源正怀着两个麦饼，即脱口应道：“腹内孕乾坤”。县令

对他的才思敏捷颇为惊异。十五岁补县学弟子员，开始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又大量阅读史书。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魏源二十岁时，举明经，第二年即随父亲到北京。在北京，他问宋儒之学于姚学棣，学《公羊》于刘逢禄，并与龚自珍过从甚密。刚刚崭露头角，他的诗已受到京师公卿的赞扬。

道光二年，魏源二十九岁，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当时已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江苏布政使贺长龄，邀请他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江苏巡抚陶澍对他也非常器重，谈起文章经济，甚为投契，有关海运、水利等事务，都和魏源筹议。道光八年，魏源到杭州，曾向钱东甫学佛教经典，并听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经。他在杭州时间不长，即回到苏州，不久又到北京应礼部试，没有中式，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内阁典籍宏富，使他能潜心研究一代掌故之学。

嘉庆末年到道光初年，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的头领张格尔在英国的支持下，从浩罕（今苏联乌兹别克东部）侵入新疆，煽起南疆四城叛乱。清政府出兵平叛。湖南提督杨芳参赞军务，魏源自请随行效力。他到嘉峪关时，张格尔已失败被俘。道光十一年，魏源因父亲去世乞假回苏州。这时陶澍任两江总督。由于两淮盐产费多价高，官盐销路受到影响，而盐枭贩运私盐情况严重，陶澍邀请魏源商筹改革两淮盐法。魏源提出“救弊先其急”，主张先改革淮北盐票制度，“裁浮费，减盐价，以轻商本”，于是官盐价格低于私盐，销路大畅，盐政收入大大增加。

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在广东、福建受到林则徐、邓廷桢等人的抵抗，不能得逞，转而北上进攻浙江。第二年，两江总督裕谦受命为钦差大臣，主持浙江海防军务。裕谦延致魏源入幕参赞戎机。这一年九月，英军攻陷定海，旋即进攻

镇海。裕谦率兵抵抗。由于提督余步云溃退，总兵谢朝恩战死，镇海失陷，裕谦兵败自杀。这次失败，对魏源的思想是极大的震动。清朝“天朝大国”的声威一落千丈，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受到严重挫伤，抚今思昔，魏源写了《圣武记》缅怀清初的武功隆盛。

这时魏源仍不忘情科举。道光二十四年，他已五十岁，再一次参加会试，果然中试。第二年补行殿试，只中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当年秋天任扬州府东台县知县。三年前，林则徐被清廷无理革职，从广东到浙江军营效力，后又再次革职，发东河“赎罪”，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会见了魏源。两人连床夜语，情意亲挚。林则徐将他主持译成《四洲志》的资料交给魏源，嘱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早就有志于斯，欣然应命。在东台任职后，特别是后来丁母忧去官，他都用了很多时间从事《海国图志》的撰述。道光二十九年服满之后，才又出任兴化县知县。

兴化是个洼地，靠近高邮、洪泽两湖，地势象釜底，夏秋两季，常有水患，因而建了南关、中新等五个坝来宣泄洪水。魏源上任的前一年，湖水上涨，坝开得早，早稻尽行淹没，结果淮、扬大饥。这一年，大暑时节就涨水，早稻还未黄熟。治河官员又要开坝，当地老百姓竭力反对，民情汹涌。魏源得知这一情况，立即亲自上坝视察，督导军民日夜筑护。河官坚持要开，魏源坚决不许，双方相持不下。由于两江总督陆建瀛的支持，才没有开坝。这时倾盆大雨下了两昼夜，长久失修的湖堤有决口的危险，魏源冒风雨在堤上巡视，几十万民众也跟着一起抢险。他的眼睛肿得象桃子，始终不下湖堤。险情终于缓和。早稻收割后，才开堤。这一年兴化周围各县都获得大丰收，老百姓喜称丰收的稻谷为

“魏公稻”。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魏源升任高邮州知州。这时他已五十七岁了，又得了疟疾，目黄体胀，痰壅气短，精神力已大不如前，几至于一病不起。

这时魏源做下了有损于一生声誉的事情。咸丰三年，即太平天国起义的第三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又夺得扬州，小支部队已到达邵伯，离高邮只四十余里。清朝军队不能抵抗。魏源组织团练，亲自巡防，并且杀死一百多个太平军。他知道团练是乌合之众，抵挡不了太平军的锐气，诡称朝廷已派大员率兵南下，现住某地。太平军不知虚实，驻扎扬州，不再向北进攻。不久，魏源被过去和他有嫌隙的淮阳兵备道奏劾罢职。第二年，周天爵以钦差大臣主持安徽军务，奏请魏源参赞戎幕，魏源再次参与镇压太平军。朝廷命令复官。这时魏源已经年过六旬，无心仕宦，于是辞归，全家避居兴化。从此他不再与闻政事，惟手订生平著述。咸丰六年，他到杭州，寄寓于僧舍，终日闭目澄心，危坐如山，绝少与人往来。第二年三月，在杭州去世。终年六十四岁。他生平爱西湖山水，死后即葬南屏山的方家峪。

魏源一生著述宏富，除《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外，还有《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老子本义》、《孙子集注》、《元史新编》、《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等等。所辑书除《皇朝经世文编》外，尚有《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等。在清中末叶的思想家、史学家中，他著述的丰富和影响的深远是少见的。

（二）

魏源出生的时候，所谓“康乾盛世”已烟消云散。中国封建

社会日薄西山。清朝政府的腐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是土地兼并情况严重，天灾频仍，庞大的官僚机构重重压在人民身上，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如白莲教起义的烽火遍及全国大部地区，西北又发生回民起义，清王朝受到极大的威胁。在国外，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虎视鹰瞵，对中国输入鸦片一年比一年增加，白银外流，人民深受毒害。国家的危机，社会问题的严重，统治阶级中的最高层并不察觉，而有识之士则深为忧虑，龚自珍曾经说：“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奢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问年岁。”^④魏源也认为清中叶已面临着比明朝更困难的局面。他说：“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漕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其它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代相出入。”^⑤在这种情况下，国计艰难，人民生活困苦，即是地主阶级中的非当权派，也往往破产。魏源自己的出身经历，更有切肤之痛。因此他深感必须进行改革，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命运。他认为知识分子都应该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反对沉迷于故纸堆中。乾、嘉以来士大夫穷究训诂考据之学，他深为不满。他说：“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训诂声音，爪剖狐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⑥惠栋、段玉裁，二王、戴震等经学、小学大师的学问，他以为是于世无补的。“六经”只是古代诗文汇编和文献资料，不能当作金科玉律，靠它来治理国家。他和龚自珍都是今文经学运动的先驱，大

力提倡“经世致用”。他为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把清初以来有关政治、社会、思想等方面问题的论文汇集成书，即是为了“经世致用”。

这个时期，魏源思想的核心是改革。他是具有进化史观的进步思想家和史学家，认为后代总是比前代进步。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是天下不同后世之天下也”。^⑧

“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世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⑨后世之所以胜于三代，就是由于不断变革，才能不断进步。他认为历史象江河流淌一样，不可复还，只能向前发展，越变革越进步，而不是后退，谁也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潮流。他说：“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丘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驽骑，而营伍，虽圣王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⑩在魏源看来，只有变革才能适应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⑪各种制度和统治方法，一成不变，泥古不化，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即使孔子在世，也会“大变其法”。因此变法、改革是古代圣贤的主张，而不是离经变道的行为。

魏源主张变革，但他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武器，只能做到继承

和发扬封建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微言大义”，加以阐扬，从而“经世致用”，并没有什么突破。比如他精研《易》、《老子》、《孙子》，为之作注，目的即在于此。他说过：“故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也。”^⑩他所重视的“变”，就是实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变革。对某些事物要不要变革，如何实行变革，魏源在代贺长龄写的《皇朝经世文编叙》中提出了四点原则：一是“事必本夫心”，但“轻重生权衡，非权衡生轻重”，所以“善心者必有验于事”。这就是说，不能离开客观实际只凭主观意图。二是“法必本夫人”，但“恃目巧，师匠，般、尔不能闭造而出合”，所以“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这就是说，不能离开工具、法度而专恃聪明。三是“今必本夫古”，但“时愈近，势愈切”，所以“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这就是说，不能离今而谈古。四是“物必本夫我”，但我必求“入夫人人之心又善出其人人之心以自恢其心”，所以“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也就是说，不能脱离众人的意志而专凭自己的主张。这些也是魏源的思想方法，总之，他认为对事物的变革切忌主观主义，而必须重视客观实际。

怎样实行变革才能扶持清王朝这座即将倾倒的大厦呢？魏源有一些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思想，但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案。他主张改革、变法，主要还是“去法外之弊”，就是在不触动封建的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在某些方面作出改变。魏源很重视人的作用。他认为要实行变革，立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则是人才。他说：“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⑪他看到清朝的统治已经十分腐败，变革主张由那些“仰食于弊”的贪官污吏、行尸走肉去实行，那是做不到的。在《默

觚》的《治篇》中，魏源详尽阐述了他的人才观。他认为人才至关重要，“国家之有人才，犹山川之有草木，蔚然羽仪，而非山麓高大深厚之气不能生也。”^⑬他似乎看到人民的力量与智慧。他说：“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孰为其鼻息！夫庶民欤！九窍百骸，四肢之存亡，视乎鼻息。”“古圣帝明王，惟恐庶民之不息息相通也。”^⑭又说：“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⑮“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舜”。^⑯魏源并不把帝王看成“真命天子”，比天下人都高明，可以为所欲为。他对人民的作用有所认识，非常强调君主必须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但是魏源仍旧没有摆脱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变革也好，政治上出现“治世”、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也好，他都寄望于“圣君明主”和“君子”。

在魏源看来，“圣君明主”君临天下，要使天下致治，必须实行古代圣贤倡导的王道。王道不是抽象的，它“至纤至悉”，具体而微，“无非以足兵足食为治天下之具”。他批评那种只在口头上讲心性，行为上躬礼义，“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以制国用，外不足以靖边圉，下不足以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安用无用之王道哉？”^⑰他认为行王道是国家富强最有效的方法，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指出那种以为“王道无近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要求君主应当“修德行”，否则即不足以“主百神而纲四方”。君主的德行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身忧天下之忧而无天下之乐”，如果“穷天下之乐而不知天下之忧”，就必然发生祸乱。

魏源还认为，天下致治单是“天子圣明”是不够的，必须有

一批“君子”作股肱之臣。他很强调君主必须善于发现这种人才，非常赞赏周文王选士、求贤的做法和取得的良好效果。他认为周朝“三分天下有其二”，首先是得天下人才三分之二。因为贤才反映老百姓的意向，贤才为国家所得，民心也就归附了。贤才最重要的任务，在于成君之德，为政还在其次。作为人臣的，对于君主的过失应当予以匡正。周公辅成王可谓典范。魏源认为人臣中有“才臣”和“能臣”之分，“小事不糊涂之谓能，大事不糊涂之谓才”。才臣不拘小节，不察细故，但能任大事；能臣处事精明，但缺乏远大的眼光。临大事，决大计，扭转局面，非用才臣不可，能臣只能在承平之世给予辅助，两者相得益彰。他对历史上一些名臣作了评论，认为张良、霍光、庞统、谢安、陆贽、寇准、韩琦、李纲都是才臣；赵广汉、张敞、陶侃、刘宴则是能臣；管仲、子产、萧何、诸葛亮，兼才、能而有之，是古今所少有的；姚崇、张咏算是这种人中的第二流人物。魏源对清中叶的时政颇有指摘。由于封建纲常思想的束缚，他对于皇帝还不敢放明目张胆有所非议，但对当时的培养和使用人才则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后世（实指清中叶）之养人用人也不然。其选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偏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偏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掇者，而望之科举免册之人。”^⑧魏源认为这种人只能是“褻陋之臣”或“腐儒鄙夫”，在他们的心目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⑨他们一味向皇帝粉饰太平，或陈述一些肤浅琐屑的不急之务，因循守旧，明哲保身，用这种人管理国家大事，政治怎能不腐败呢？

总之，魏在鸦片战争之前，他企望变革，具有历史进化的观

点，是应当肯定的。尽管他的人才观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但在清中叶“万马齐喑”的时代，他敢于正视现实，打破陈腐的观念，也是非常可贵的。

（三）

魏源的思想在鸦片战争之后，有显著的变化与发展。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迫切要求向西方学习，是他思想的核心。

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肆意对中国进行侵略，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威胁着中国的生存。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世界大势懵然无知，还自以为“天朝君临万国，有不测之神威”^②，凡事泥旧，惟知傲慢自尊。战争打起来时，道光皇帝一再发出令人笑倒的谕旨，询问有关情况。如一道谕旨说：“该国（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③另一道谕旨说：“（英国）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该国制造鸦片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或另有诡谋？”^④可见中国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战争中道光皇帝从主战转变为主和，他和投降派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所吓倒，压制抵抗派，使这次战争以割地、赔款、签订《南京条约》而告终。对于这个奇耻大辱，顽固守旧的投降派虽也感到战争失败对自己不利，但又以为签订条约之后，满足侵略者的要求，仍可相安无事，再做他们“天朝大国”的美梦。一些爱国的志士仁人，则受到极大的震动，认识了局势的严重，如果不采取对待侵略者的有效措施，中国前途将不堪设想。魏源是后面这种人中之佼佼者。

魏源亲身参加鸦片战争，目睹英国侵略军在浙江的暴行，这对激发他的爱国思想是有关系的。战争失败之后，痛定思痛，他立志要提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抵抗外国侵略的方案。起先他因为“海警颺忽，军问沓至，忼然触其中之所积”^②，发愤而作《圣武记》凡十有四卷，四十余万言。《圣武记》反映了他反对外国侵略，要求振兴中华的进步思想。他引用古书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希望战败之后举国同仇敌忾，能重振国威。他对清初的赫赫武功异常怀恋，希望再度出现清王朝“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行令，四夷来王”的盛世。这种思想有它正确的一面，即希望国家强盛。但也有消极的一面，清初的“盛世”曾经镇压人民反抗、镇压少数民族，这是他所不能认识的。后来他著《海国图志》，这部书集中反映了他的强烈的爱国思想，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方案，比《圣武记》大大进了一步。《海国图志》的史料来源，魏源自己说“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则徐）所谓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说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③根据书中所引的材料看，涉及中西人著作很多，总数不下五十种。除书面材料外，他把从英军俘虏口中了解的情况也写入书中。上面说的“夷语”，大概指此。书中还附有地图、沿革图。这部书的写作时间，据魏源的儿子魏耆的《邵阳魏府君事略》说：“丙午（道光二十六年）夏，以母忧去官，……以前年英夷议抚，当事者为其穹远，不谙底蕴所致。遂于读礼之暇，搜览东西南北四洋海国诸记述，辑《海国图志》及轮船、机器各图说，成六十卷，以资控制。”也有人说，这个记载不确切。这部书是魏源于道光二十一年在京口接受林则徐的嘱托后便着手撰写的，第二年冬天成书，初为五十卷本，六十卷本是道光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增补成的。咸丰二年又增至一百

卷。后面这种说法较为合理。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说，写这部书是因为“夷烟流毒”之后，“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懣，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这部书是忧愤之作，是谋划对付侵略者的策略之作。关于本书和过去海图之书的区别，魏源说：“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⑤书中系统地谈到外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况；讲了洋船、洋炮，比起以前的同类书籍，内容充实得多，反映了当时对外国了解的新水平，因而也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参考价值。

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史上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魏源是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当时中国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向西方学习是明智的行动。顽固派对此是竭力反对的。认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淫巧之为，荡人心志”；学习西方是“示弱外夷”。魏源却坚持他的主张，他明确指出《海国图志》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⑥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即抵抗外国的侵略，这多么有远见！魏源针对顽固派的糊涂看法，进行了尖锐的驳斥。他说：“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烟毒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⑦指出了顽固派的愚蠢。他辩解说：“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⑧这里魏源更明确申述学习西方技术，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中国也能和列强并驾齐驱，而不受其欺侮，这和“示弱外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自己落后而不正视现实，就只能永远处于软弱受欺的地位。魏源的爱国精神和学